

教育與權力

一個批判的分析

林本炫 鄧川雄◎編

教育與權力

一個批判的分析

作者：羅賓·威爾遜
譯者：陳永發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 / 林本炫、鄒川雄編。-- 初版。--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教社所，2004[民93]

面；公分。-- (教育與社會叢書；7)

ISBN 957-8210-43-4(平裝)

1. 教育改革－論文，講詞等 2. 教育－臺灣－論文，講詞等

520.7

93002459

教育與社會叢書 7

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

2004 年 3 月初版

編者：林本炫、鄒川雄

發行人：蘇峰山

出版者：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地址：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電話：(05)272-1001 轉 2311

傳真：(05)2427150

網址：<http://www.nhu.edu.tw/~edusoc/>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 5 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41299514

定價：250 元

ISBN 957-8210-43-4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序

這本書是南華社會科學院接受國科會「提升私校研發能量」專案補助，「市場、國家與教育：一個多層次的社會學分析」整合型研究計畫的一部份成果。在這個計畫底下，南華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以及應用社會學系的老師們，一直致力於有關市場、國家與教育三者關係之研究，這幾年來已經獲致不錯的成果。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將其中的一部份成果，以「市場、國家與教育：教育社會學的分析」為書名先行出版，編入南華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的「教育與社會叢書」，而「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這本書，則可以說是本研究團隊持續思考三者關係的另一部份成果。

思考教育問題，乃至於探討教育改革問題，不能不將權力因素帶進來。認為教育是一個純潔無暇的領域，那是過於天真的假定和想法，至少受社會學訓練的人不會這樣看。權力是無所不在的，教育場域當然也充滿權力的影子。從政策的制訂、經費的分配，課程的設計和教科書的編撰，乃至於研究生撰寫論文、教授指導研究生的身心勞動，也都是權力的縮影。而教育改革更是涉及到教育領域裡的相關行動者，其彼此間權力的重分配。思考教育問題而不談權力關係，不但不能深入瞭解教育變遷的真正動力，也會落入直線性思考的盲點。

這本書一共收錄本研究團隊成員的十篇論文。前兩篇是總論，檢討台灣近十年來教改的論述與知識社會學基礎。後面八篇則是探討台灣教育各個領域的問題，範圍從幼稚園到研究所，從教師人力結構到利益行動者，從國家霸權到文化

價值觀。每一個問題都可以扣連到教育與權力這個主題，也都是國內教育重要的課題，範圍則從國內教育到全球化對教育的影響。

蘇峰山的「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市場——從英國教改談台灣教改的市場論述」一文，指出一個非常重要但在國內少被注意的課題，亦即，市場化做為教改論述的主張，在台灣被認為進步開放，但在英國卻常被攻擊帶有保守主義色彩。就台灣的政治社會脈絡來看，市場化主張是針對以往威權國家體制對教育的強力管制而發，市場對抗國家並非是效益的追求，而是有其政治意涵的。相對於此，在英國，市場化所代表的未必是市場對抗國家，在教育領域中，似乎更像是市場對抗社會，也因此其在政治上會被視為是保守的。因此在台灣的我們需要反省的是，當原有威權國家及許多基於政治考量的管制消除後，市場化真能代表開放、進步與多元嗎？作者指出這不只是意識型態或規範層次的問題，也是在經驗層次上值得研究的。

鄒川雄的論文接著提出一個有關教育改革歷程的行動社會學分析架構，針對今日台灣高等教育改革所產生的各項問題與迷思，進行批判與反省。鄒文援引 Polanyi 的默會知識理論、Bourdieu 的慣習與實踐理論以及 Habermas 的生活世界理論，形構一個以默會慣習為核心的行動社會學方案。透過此一方案處理三種可能的教育改革的知識類型：工具主義類型、詮釋類型與批判的行動類型。這篇論文以「系統」及「生活世界」的辯證關係，展開教育改革歷程的批判分析。其基本假設在於，行動者在教育改革歷程中既不從屬於結構，也非完全憑意志而行。這其中行動與結構之間存在著互動與選擇的關係。本文從反對工具主義類型出發，反省今日高等教育改革的四大迷思：中央資源分配迷思、績效主義迷

思、量化評鑑迷思以及國際化即英語化迷思等。

黃庭康的「國家霸權與教育——戰後新加坡及香港華文學校身份」，討論二次大戰後新加坡及香港國家權力形構與華文學校身份的相互關係。從這兩個歷史個案，我們看到國家政策往往帶來意料之外的，具諷刺味的後果。新加坡及香港的歷史比較個案顯示國家政策的目的及後果的關係是甚為微妙的，國家與教育的關係是相互的、受特殊歷史條件所影響的。新加坡的情況顯示，國家政策往往受到多種因素所影響，政策制訂者的意圖不能決定政策執行的結果。香港的歷史個案呈現了國家與教育的另一種複雜的關係——國家政策經常導致出乎意料之外的副作用，結果是預防了社會的分裂與衝突。

何明修的「台灣幼兒教育券的政治邏輯：政策、選票與集體行動」一文，則分析台灣幼兒教育券發放的政治過程，是台灣極少數以社會運動架構分析教改政策的論文。在一般研究作品中，教育政策變遷常被認為是某些結構過程的必然結果，相對於此，本文特別重視政策提倡者的角色，亦即，私立幼稚園的業者團體。在台灣，民主化迫使官員更重視民眾對於平價幼兒教育的需要，公立幼稚園在九〇年代中迅速擴張。私立業者為要保護他們的市場佔有率，發動了一場爭取政府補貼私立幼教家長的運動。在這個幼兒教育券運動中，業者採取了教育改革的框架，動員社會支持，並且與政治菁英進行交換。在台灣幼兒教育券的政治過程中，商業利益集團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甚至足以影響政策制訂的方向。要瞭解教育和權力的關係，本文可以說是典型的作品，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徐聖堯、楊靜利與王仕圖三位合作撰寫的「國小教師之

供給量與需求量推估：民國 92-102 學年度」一文，利用現有教師人數、師資培育人數、以及幼年人口數之統計資料，配合師生比與教師退休申請率與核可率之設定，估計未來十年國小教師人數之供需落差。研究結果顯示，未來的落差相當大，「合格但無法擔任教職人數比例」最低為 67%，最高可超過 100%。雖然「調降師生比」、「加速退休」與「抑制師資培育」等均是可能的解決辦法，但各有缺點；此篇文章指出不一定要將國小師資供需落差視為「問題」，供給量遠大於需求量可以讓學校在甄選教師時擇優錄用，對於提昇國小教師品質其實是美事一樁。

周平的論文是一篇很特殊的論文，從論文題目就可以看出來。這篇論文將學院場域視為一個生活世界，在其中，研究生以論文做為其勞動的媒介，但將注目的焦點放在論文勞動所牽涉到溝通互動問題。本文特別強調在制度化的學院傳統中，研究生如何學習並實踐一種學術規範和禮儀，這與其中的儀式性實踐和規訓與懲罰機制扣上關係。具體而言，本文比較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生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所經歷的通過儀式和規訓與懲罰程序。本文的結論是，相較於自然科學中須作實驗的研究論文，社會科學研究生論文寫作過程所牽涉的學院規範和師生互動是「低度社會化」的（undersocialized）。自然科學的研究生在實驗室進行論文相關研究時，所遇到的與學術傳統相關的規範和師生互動關係，實際上是「過度社會化」的（oversocialized）。

翟本瑞的「台灣教育體系中近親繁殖的影響研究：以師範院校為例」，是和學術社群內部權力有關的另一篇論文。台灣教育體系中存在著「近親繁殖」的現象，雖然許多人都意識到相關的問題，然而，此一議題始終是學術研究的禁忌領域，顯少有較為深入的討論。翟文從散在各處的報導及網

頁資料出發，並以十位不同背景受訪者深度訪談資料，探討存在台灣教育體系中近親繁殖的現象，以及其可能影響。近親繁殖不只涉及學術上的公平與正義，還會影響學術發展。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教育領域中的近親繁殖更是影響深遠；就師範院校而言，近親繁殖也就複製了學閥、門戶，以及保守的心態，教出來的學生，未來如果進入教學領域，這種心態也就會形塑出特定立場的意識型態。在師資培育壟斷於師範院校的時代，師範院校基本上是非競爭性的，高中以下的教師養成，一定要透過師範院校的培訓才能取得任教資格；然而，如果相關訓練只為取得資格，並未達到教育目標，這些現象也就成為教改中，為人垢病的重要議題。

過去數十年間，台灣學生大量到海外留學，美加等英語國家更是眾人選擇的首要考量。然而，由於我國並無長期規劃的留學政策，赴海外學習固然可以將最新知識與科技引介到國內，但也因而產生相當的副作用。學術移植的結果，使得高等教育無法生根、落實。尤有甚者，在 WTO 架構下，高等教育成為市場化的商品，全球高等教育將淪為英語系國家的重要輸出項，對台灣高等教育有著負面性影響。翟本瑞的「全球化對台灣高等教育影響之研究：以留學政策為例」一文，對這一問題有很深刻的反省。

而林本炫則接續此一問題，透過電子公文系統，對台灣 154 所大學校院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各大學對於我國加入 WTO 之後的認知和因應措施。在回收的 111 份有效問卷裡，絕大部分學校對於我國對 WTO 的教育服務承諾都只有部分清楚，大部分學校都擔心外國人來台設立學校將對我國大學產生衝擊。基於全球化的潮流，近半數學校主張鬆綁外國學歷與大陸學歷的採認，但反對者也不少，主要的理由都是認為外國大學和大陸大學的辦學水準不一，品質難以掌控。

而在因應措施方面，本文發現最多學校採用的措施是和外國大學互相承認學分或者建立雙聯學位，就教育服務的貿易往來而言，此種作法類似於一般貿易的「進口替代」。本文是國內少數甚至唯一探討各大學對我國加入 WTO 的認知和因應的論文，值得關心此一問題的讀者參考。

齊力對家族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關係一直很關心。一般人總以為個人主義和家族主義是相互對立、此消彼長的。齊力的論文中，則主張兩者並非對立關係，家族主義和個人主義是有可能並存的。這個論點對於當前強調個人主義的教育內容，其實可以有很好的啟發。個人主義是否一定要以家族主義的衰落、家庭功能的萎縮為代價？讀者可以從這裡開始思考。

如前面所述，這本書的內容是南華教育社會所和社會所的同仁，近幾年對教育問題的思考與研究成果，也是一系列教育相關著作當中的一個作品，藉此對教育提出不同的、批判的，具有社會學基礎的反省。希望這本書對當前混沌的教改爭議問題有所貢獻，也請讀者不吝給予指正。

林本炫、鄒川雄

2004 年 2 月 13 日

於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社會學所

出版系列 在教育學與社會學的領域裡 我們嶄露頭角

意識、權力與教育

編者／蘇峰山

定價／250 元

師資培育制度變革的社會學分析

作者／紀金山

定價／250 元

高等技職教育轉型的社會學分析

作者／林大森

定價／320 元

市場、國家與教育：教育社會學的分析

編者／齊力、蘇峰山

定價／250 元

臺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

編者／齊力、董旭英

定價／300 元

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編者／齊力、林本炫

定價／220 元

重塑自我的遊戲：網路空間的人際交往

作者／黃少華、陳文江

定價／250 元

數位年代的女性啟蒙

作者／袁蕙晴

定價／200 元

連線文化

作者／翟本瑞

定價／250 元

科技未來與人類社會：從 Cyborg 概念出發

作者／蘇健華

定價／200 元

網路同儕對 N 世代青少年的意義：認

同感的追尋

作者／陳俞霖

定價／200 元

線上遊戲的魅力：以重度玩家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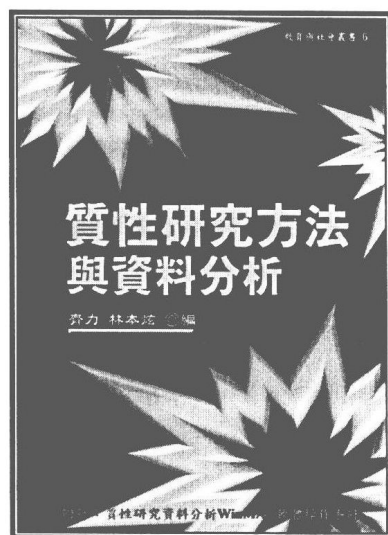
作者／陳怡安

定價／200 元

康德哲學問題的當代思索

作者／李淳玲

定價／320 元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 5 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41299514

《教育與權力：一個批判的分析》

目 錄

編者序／林本炫、鄒川雄	i
01.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市場——從英國教改談台灣教改的市場論述／蘇峰山	1
02. 從生活世界的默會實踐觀點論今日台灣高等教育改革的迷思——一個高等教育改革歷程的行動社會學分析／鄒川雄	19
03. 國家霸權與教育——戰後新加坡及香港華文學校身份／黃庭康	59
04. 台灣幼兒教育券的政治邏輯：政策、選票與集體行動／何明修	81
05. 國小教師之供給量與需求量推估：民國 92-102 學年度／徐聖堯、楊靜利與王仕圖	113
06. 社會科學「不科學」與自然科學「不自然」：比較兩個領域研究生論文寫作過程的儀式化和規訓與懲罰／周平	133
07. 台灣教育體系中近親繁殖的影響研究：以師範院校為例／翟本瑞	161
08. 全球化對台灣高等教育影響之研究：以留學政策為例／翟本瑞	199
09. WTO 與教育服務：我國各大學相關認知與因應措施的探討／林本炫	221
10. 台灣的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齊力	255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市場： 從英國教改談台灣教改的市場論述¹

蘇峰山

南華大學教社所

一、前言

1979 年，英國保守黨勝選，柴契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以新自由主義理念為引導，針對英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體制，進行一連串市場化導向的變革，其中教育制度亦未能免之。1979 年以來，柴契爾夫人政府的教育改革政策都匯集在 1988 年《教育改革法案》（1988 Education Reform Act）之中。一般認為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與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在教育部門的落實，市場化成為這次教育改革的主軸。改變了英國自 1944 年《教育法》（1944 Education Act，或稱之為 The Butler Act），以及 1967 年《卜勞頓報告書》（Plowden Report）以來，關於教育理念與制度設計。一般認為這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教育體制的重大變革（Ball, 1990; Whitty, Power and Halpin, 1998）。

1990 年代以來，台灣也展開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只是與英國不同，這一連串的教育改革行動是由民間社會發動，而非由政府主動發起的，民間社會教改運動的興起當然與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動開放有關，自 1987 年起，教師人權促進會、人本教育基金會、振鐸學會、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台灣教師聯盟等關懷教育問題的教改團體陸續成立，這些力量匯集

¹ 本文是〈權力介入與教育市場化：英國與台灣教育結構的比較研究〉，【市場、國家與教育：一個多層次的教育社會學研究】第三年研究報告(部份), NSC 91-2745-P-343-001，國科會提昇私大研究能量專案，2003，嘉義：南華大學。

為 1944 年「四一〇 教育改革大遊行」，並成立「四一〇 教育改造聯盟」。同年六月，政府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會後決議成立專責教改機制，同年九月，「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成立，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擔任總召集人，匯集社會各界意見，於 1996 年年底，委員會結束任務編組，並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被認為是爾後教育改革的行動指導方針。同一時間裡，台灣的執政黨尚未更替，然而教育部長的更迭及其作為已經與傳統國民黨執政時代有所不同，教育改革運動可說是對國民黨主政四十餘年建立的教育體制的批判與變革（蘇峰山，2003）。

雖然都是教育改革行動，英國的教育改革是由中央政府發起，由上而下，帶有政治保守主義色彩的改革行動。台灣的教育改革卻是由下而上，民間團體持續施壓，政府回應後，設法吸納民間的改革力量與意見，強調開放，多元進步的改革行動。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可比較，又能怎樣加以比較呢？或者將之並列只是牽強之舉？國內學者介紹英國教育改革的文章不少，有許多甚至論及其可以借鑑之處，（李奉儒，2001；周佩儀，2000；姜添輝，1999；蔡清田，2003；楊瑩 1994）卻幾乎未有論及這兩者之間有何可以比較研究之處，頂多只是論及英國這個「先進的」國家，其教育改革有什麼值得借鏡之處。此外，台灣教育改革運動發生的時間雖較英國為晚，但期間並無任何因果關係，至於近來所謂全球化的影響，更是沒什麼關係，那麼探討英國教育改革，對於思考台灣教育改革究竟有何意義？其關鍵在於「市場」，以及如何重新定位國家與教育的關係。事實上，台灣教改運動雖然不是受到英國教改行動影響所致，但教改行動展開之時，甚至現在，關於教育市場化與去管制的討論，有許多都是在類似英美教育市場化的理論架構下進行的。（朱敬一，戴華，1996；戴曉霞，莫家豪，謝安邦，2002）然而教育市場化的思考與制度運作究竟是如何？對台灣教育改革有何意義，以市場化的論述重新定位國家與教育的關係，是適合

台灣教育改革的方向嗎？這些是我們探討台灣教育改革的理念、制度規劃與社會結構層面所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我們希望藉由對英國教育改革中，市場化理論及相關爭議的探討，做為我們思考台灣教育市場化論述的參考。因此嚴格說來，本文並非真正的比較研究，因為我們並沒有一個理論架構，以資比較台灣與英國教育改革形成的脈絡及其理論上的意義。所謂全球化，自由化的趨勢做為理論參照點，實在是學術流行多於實質意涵，並不能做為理論架構。本文也不擬對許多制度及政策措施進行詳細具體的比較，而是探討其結構背景及相關論述。因此本文只能算是一初步的探索，希望釐清在看似相同的市場化論述中，可能隱含著全然不同的思考、現實情境，與政治脈絡。而不論我們希望在價值規範層面，嘗試以市場化來構思教育改革的未來方向，或是在經驗研究，以市場化為概念模型，來建構對於台灣教育改革相關問題的研究，都有必要對於市場概念，在理論與經驗意涵上，加以釐清。

二、1944 年教育法所建立的英國教育體制

許多人認為 1988 年，英國的《教育改革法案》標示了教育市場化的主張與規劃，因此也引發須多相關的爭議。（Ball,1994；Chubb and Moe,1990；Grace,1994；McLanghlin,1994；McMurry,1991；Tooley,1996；Whitty,1998）然而為何會有那麼多爭議，以及以市場做為處理教育部門的機制到底有何特殊意義，我們必須將 1988 年的法案置於英國近代教育史，尤其是《1944 年教育法》以來的教育體制架構中，還有對於福利國家的相關思考中，才能掌握其意義。因此我們先對 1944 年以來，英國教育體制的演變做一簡要回顧。

英國現代教育體制肇始於《1944 年教育法》，而《1988 年教育改革法案》則是對此體制進行最大的變革。簡而言

之，這兩者隱涵了兩組極為不同的教育理念。前者試圖在追求社會和諧以及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下，進行對以往英國教育體制的改革。而後者則更強調效率與競爭力，依此來改變 1944 年以來建立的體制。然而這個簡單的說法並不足以掌握其體制變革的過程，我們必須對此有進一步的說明。Cowen 將英國現代教育體制的變革分為三個主要的階段，即第一階段乃是根據《1944 年教育法》所建立的體制模式。第二階段則是 1954 年至 1975 年，延續 1944 年教育法的精神，並解決 1944 年教育法所形成的問題。1970 年代末期，英國教育制度與英國經濟發展的關係成為政治關心的議題，因此在 1979 年，保守黨執政後，展開另一波的教育改革，其高峰乃是 1988 年教育改革法，這乃是英國教育變革的第三階段（Cowen, 1991; 李家宗, 2001）。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各政黨之間的分歧稍減，人們更關注戰後的英國將成為怎樣的國家。戰後工黨主政，更致力於追求社會公平與財富平均化的社會政策，而國家對於產業及經濟部門則採取較為積極介入與控管的經濟政策。這種福利國家的思考也影響了對於教育體制的檢討，就如政府必須保障國民的福利（welfare），政府有責任提供國民教育機會。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大不列顛管轄下的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等地已有普遍的初等教育，兒童通常在十三、四歲畢業離校工作。而中等教育則主要有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文法學校的畢業生則成為白領階級，或者繼續升入大學，然而初等學校畢業進入文法學校就讀的比例很低，因此 1944 年教育法的目標乃是將國民教育延伸至中等教育階段，建立所謂三合一體制（The Tripartite System），即由文法中學，技術中學與現代中學構成三種中等學校型態，另外還有少數私人設立的公學（public school），如此一來建立一個可以包含十一歲至十五歲青少年的中等教育體制。

1944 年教育法的體制及其後相關的發展有幾個特點。首先雖然有一個含納所有青少年的中等學校體制，似乎達到教育機會開放均等的目標，卻也隱含一種階層化的現象，某種教育公正的理論（theory of educational justice），典型代表乃是《諾伍德報告》（Norwood Report）。該報告依兒童能力將兒童劃分為三類，這個討論恰好提供將兒童分配到不同學校的理論基礎。「能進行連貫推理的兒童」進入文法學校，「在應用科學或實用工藝領域具有明顯興趣與能力的兒童」進入技術中學，其餘的則進入現代中學。這種分流教育的設計乃是主張，根據兒童不同的能力與性向，提供良好的教育。分流的篩選機制乃是十一歲的考試，為智力、英語與算數的綜合測試，構成一種智商分數，大約 20% 智商最高的兒童進入文法中學，有應用科學傾向而分數高的學生進入技術中學，其餘 70% 左右的學生則進入現代中學。

這種普遍卻又具有階層分流篩選的教育體制，其課程形式也有不同，同樣反映諾伍德的兒童能力性向類型預設。文法中學是傳統的學術課程，現代中學則不強調學術課程，分科不細，也有部分技術課程。技術中學則偏重應用與技術性課程，並且比較符合當地的企業需求。而在文法中學及公學中，學生很早就專業化（specialization），通常在十三歲左右就必須選擇繼續唸文科或理科，這種過早專業化乃是為進入大學做準備。而大學主要也是從文法中學和公學來招生，其招生約佔同齡人口數的 25%，也大約就是文法學校和公學的學生數。

由此可見，1944 年教育法強調國家全面提供教育的義務，與普遍的福利照顧是基於同樣的思考原則。然而依某種分配的教育公正理論，也強調依學童的能力、性向，予以分流，提供不同的教育形式。這個看似公平的學校體制卻進一步鞏固英國社會的階層化體系。基本上，這個教育體制培養的是一小群中產階級，其次則是少數的技術工人與領班，而

大多數的青少年則成為無特色的勞工。這個看似公平卻又深具階層化色彩的教育體制，其矛盾乃是下一階段英國教育體制必須解決的問題。

在 1944 年教育法案中，教育部（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取代原先教育委員會，成為中央政府最高教育單位。教育部成為地方教育局（LEAs,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之間，還有 LEAs 與公眾及地方首長之間的協調者。教育行政採取地方分權方式，中小學業務以 LEAs 為主體，中央政府很少干預。中央教育部、LEAs 與教師專業組織維持一種均衡的「夥伴關係」。中央得以文件行文地方，但僅止於建議而非強制的命令，文件的內容大多是透過地方教育官員、教師組織進行諮詢的結果。這些管理、執行、監督與公文特性反映出中央與地方分權治理的夥伴關係。地方教育官員並非全然自由行動，但亦非受制於人。教育部與教育部長並非指揮者，但也不只是協調者。中央法令政策雖然有其強制力，卻更常應用引導、諮詢及社會壓力網絡來進行，教育部與地方教育局皆不願打破這種工作夥伴關係（Locke, 1974），這種夥伴關係卻在 1988 年的教育改革法中被打破。

三、1954~1975 年之教育變革

如前所述，1944 年教育法建立了一個含納六到十五歲學童，普及的義務教育體制，然而其分流機制卻又同時鞏固現有社會階層化現況。因此從 1954 年到 1975 年間，整體關於教育體制變革的相關爭論乃集中於教育公平性的問題，形成所謂教育機會取得的政治學（politics of access）。

首先是對於十一歲考試的爭議。因為十一歲考試決定了中學分流的標準，升學導向對學童的壓力，以及對教學的不良影響成為爭議的主題。可是爭議的核心乃是隱藏在三種中